

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

◆冯建明

在我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不仅是高水平大学自身的内在动力,而且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高水平大学建设,不单纯是高等教育自身和学术意义上的,更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在众多因素的综合考量和平衡中,高水平大学面临着一些两难的困惑与抉择。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有助于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文选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规模效应与特色发展进行阐述,期求对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贡献一孔之见。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办学模式、发展方略、建设路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借鉴,从追求形似到企望具有实际功效;我国高水平大学也会在一些核心指标、数据甚至排名上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并不断修正和调整政策,以尽快达到赶超的目的。这就是大学建设的工具理性思维。而从大学的终极价值出发,专注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活动,专注于培育大学的精、气、神,但务根本,不求闻达,但求理想,不计事功,则可视作大学建设的价值理性思维。

由于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因素,我国的高水平大学目前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全球教育界、科技界的话语权还比较微小,其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还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国政府先后启动了“211工程”和“985工程”,期望迅速提升我国一批高水平大学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尽快接近、达到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将人才工作和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提升到历史的新高度,指明了未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规划的总体目标与方向,突出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这既为我国高等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应地,我国的高水平大学也根据自身实际,借助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适

时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了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步伐。表现在办学实践中,一是我国高水平大学树立了更加高远的理想,将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作为奋斗目标,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二是进一步确立了国际视野,加大了对世界高水平大学办学模式和办学规律的研究,借以推进、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期求发展速度和建设成效的最大化;三是主动确立参照系,在办学规模、院系设置、学科布局、人才队伍、科技成果等指标和数据方面与相应的世界知名大学进行比对,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期缩小差距,逐步赶上。应当认识到,无论是从政府还是高校来说,采用工具理性思维,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抉择。从实施的效果来看,我国高水平大学近年来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一批高水平大学在与同类世界知名大学的角力中渐入佳境。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对价值理性的追索。例如,在昂首阔步朝着世界高水平大学前进的同时,人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大学越来越面临精神缺失和文化危机;大学校园越来越大,越来越美,越来越气派,但道德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却不升反降;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层次日渐丰富,但全社会对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却颇多微辞;科学技术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但“两弹一星”式的重大成就和划时代的鸿篇巨制寥若晨星;论文、项目、获奖、专利等反映学术能力的数据屡攀新高,但关于大学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的质疑与批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学教授队伍越来越庞大,学历层次越来越高,称谓越来越多,但与师表形象和人们期待的科学巨匠、人文大师似乎渐行渐远。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在一段时间以来重指标轻根本、重数量轻质量、重物质轻精神、重科研轻教学,偏离了价值理性的发展轨道所致。

处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生存夹缝中的我国高水平

大学究竟该做何种抉择?这确实是一个两难而又非常关键的课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固然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一定势同水火。相反,只要运用得当,二者完全可以统一和共同服务于高水平大学建设。我们不能完全摒弃工具理性,主动封闭自己的视野,置身于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之外盲目发展,也不能忽略大学的终极价值,一味追求高指标和华丽的数据,而忘记思考“为什么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好大学”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工具理性,以世界高水平大学为范例和榜样,全方位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办学经验,提高建设效益,在关键且可比的指标上勇敢地与他们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也应当更加重视价值理性,立足大学根本,充分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精心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精神,引导和规范大学师生追求真理,崇尚道德,探索新知,贡献社会。当然,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并行可能会导致大学建设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对此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两难之中趋利避害,寻求更加稳妥和科学的解决方案。相形之下,在涉及高水平大学功能定位、办学方向、发展战略等带有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应更加倚重价值理性;在具体的办学方略、制度设计、政策保障等战术层面上,高水平大学更宜采用工具理性思维。

二、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

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基本职能。因此毫无疑问,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必须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大学服务社会,当然不是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是主要通过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和利用自身的人才、学科和科技文化优势助推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我们认为,在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提速、社会转型加剧和文化变革深刻的关键时期,高水平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应当也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当前政府积极提倡、鼓励和扶持大学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面向市场办学,大力为地区、企业发展服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学自身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和呼应企业需求,大力开展各种产学研合作和人才培养等社会服务工作,也是一个必须和正确的现实选择。

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除了服务社会,高水平大学还应该正确地引领社会进步。英国高等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Ash-by, E.)认为,大学不仅要满足社会对它提出的各种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的发展起指导作用。他说:“如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中,能胜任人类远大目标的指导任务和人类未来利益的管理任务的,似乎以大学最为适宜。”无论从大学的功能、性质还是从大学的价值观和所处的知识层次来看,高水平大学都应当处于社会的顶层。它当

然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但绝对应当远远高于社会的整体水平;它当然不能固步自封于“象牙塔”之内,但绝对应当保持高贵、超越现实的理想信念;它当然不免受到社会大环境和现实文化思潮的影响,但绝对应当坚持操守和品格,并在精神建树、科技创新、思想革新等方面开风气,领潮流,立表率。因此,高水平大学应当时刻牢记自己引领社会进步的光荣使命,通过培育优秀人才、开展科技和文化创新等,引导社会朝着科学、理性、文明、富裕的方向发展。舍此,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将大大降低。因而,高水平大学既要苦练内功,增强底蕴,提升内涵,又要坚持本色,恪守底线,始终屹立于社会的最高水平。一句话,既要具备引领社会的能力,又要具备引领社会的资格。

服务与引领孰重孰轻,孰先孰后?高水平大学必须对此做出明确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国高水平大学引领社会进步的意识 and 能力,也不应当否认其为此付出的各种努力。但现实的情况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和社会过于强调和不断强化高水平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而忽略了高水平大学引领社会进步的使命。从政府的角度审视,我们大声疾呼高水平大学要转变观念,冲破围墙,走出象牙塔,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市场开门办学,开放办学;极力提倡高水平大学积极融入和服务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甚至出于对大学服务社会的强烈期待而规定了大学“以服务为宗旨”的办学指导思想。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高水平大学都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学校最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各大学创办的区域性分校、研究院和创新载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学的教授和科技人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与企业开展横向科技合作或创办科技型企业上。在承认上述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此种潮流已经造成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在办学宗旨、目标、定位和发展战略上显得含混不清;大学的思想、文化、科技引领作用日渐式微;大学世俗化、功利化的色彩日渐浓厚,大学教授们“教书育人”、“安贫乐道”、“皓首穷经”的传统形象正在遭遇大面积甚至根本性的颠覆。凡此种种,可以视作我国高水平大学在政府的强力推进和社会广泛驱使之下的无奈之举。它是必需的,但完不是完整和值得警惕的。

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不忘引领社会进步,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必须遵循和坚守的发展原则。因此,高水平大学在制定发展战略、功能定位、建设目标和办学思路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表述;在教学、科研、对外合作等工作的组织实施和具体部署中,都应有通盘考虑和制度安排;在对师生的教育、管理上,一方面应有意识地灌输、强调这种理念,另一方面也应建立切实有效的政策,引导和规范广大师生的思想与行为;大学还应加强舆论宣传和相

应的激励、监督、保障机制建设,弘扬先进文化,褒扬崇高师德,纠偏不当言行。与此同时,各级党委政府也应更加尊重教育规律和大学之道,既要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好高水平大学的创新资源,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又要充分认识到高水平大学的特殊性和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利用政策、舆论、资源等优势,帮助支持高水平大学朝着更加高远的目标前进。政府尤其要极力避免为了经济发展而赋予大学太多的、不切实际的功能,从而扭曲高水平大学的办学目标和价值观,稀释高水平大学的创新资源,削弱大学的引领作用。

三、规模效应与特色发展

我国的高水平大学除了必须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还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国内竞争压力。由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面临追求规模效应与大学特色之间的艰难抉择。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水平大学,虽然历史传统、隶属关系和学科布局不尽相同,但大都具有较大规模,即校园面积较大、学生规模较大、师资数量较多、学科门类较全。相应地,这批大学所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也较为丰富,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其师资、学科的数量等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在层次、实力接近的大学之间对比更加明显。例如两所实力相当、同为“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其中规模更大的一所,往往因为其师资数量更多、学科门类更加齐全而获得更多的项目、经费支持,取得更多的教学科研成果,继而又从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获得更加充足的经费支持。这就是事实存在的因办学规模带来的“马太效应”。再从各种纷繁复杂的大学排行榜来看,规模效应也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层次接近的高校规模越大往往排名更加有利,也就往往更容易得到社会甚至政府部门的认可。这一论断当然不乏反证,但从近年来政府支持和大学排行的实际来看,应该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国高水平大学,尤其是综合实力位居全国最前列的数十所大学都具有较大甚至超大的办学规模,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上世纪末国家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学生规模迅速增加使得大学的校区、校舍、师资都大幅增加;二是本世纪初起国家实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组,实行了高等学校新一轮调整合并,催生了一批巨型大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高校格局;三是各高水平大学迫于竞争压力而努力扩大规模,加大人才引进,设置新兴学科和开设新的研究方向,学校体量不断扩大。应当承认,办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高水平师资的集聚和高水平学科的增加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也为高水平大学向更高目标迈进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一批新兴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其多学科的协调发展不仅壮大了其综合实力,也为师资的整合、学科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假以时日,这种规

模效应还将日益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水平大学追求规模效应,不宜简单否定,也不能笼统地概括为贪大求全。

特色也是高水平大学的追求目标,而且往往是跟优势紧密结合的。“一所大学的办学特色是以其凝练的办学理念为基础而形成的、被社会公认的优势办学特征,是其在办学风格和理念上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标志性特征,是其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管理水平的反映,也是其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通常所说的大学特色,是从学科意义上定义和概括的。特色是一所大学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积淀,是其区别或领先于其他大学的制胜法宝。高水平大学总是千方百计地精心呵护和不断培育自己的特色,并努力将自身特色变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规模效应的影响和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强烈冲动,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几乎无一例外地朝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特色日渐丧失,或者说湮没在与日俱增的学科群中。

如何在规模和特色之间寻求最为恰当的平衡,这是对高水平大学的一个考验。我们认为规模有其优势,特色也有其局限;规模不应无限扩张,特色也可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创造。首先,高水平大学应坚决抵制住规模扩张的诱惑与冲动,合理利用好有限的物质资源,在现有规模基础上做精做强,尤其在提升内涵发展和提高质量上下功夫。除了看准的新兴学科,一般来说高水平大学不宜再行增加新的学科门类,设置新的教学专业,更不宜继续扩大本科生、研究生招生规模。对一些重复设置且无关紧要的学科和专业,可以适当筛减甚至停止招生,引导这些学科或专业的教师向外校分流或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其次,高水平大学应牢固树立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后有为,以特色立校,以特色制胜。要基于现有的学科布局和师资队伍,凝练特色学科,汇聚特色人才,让最优最特的学科和人才走向世界,让较优的学科和人才变成最优。高水平大学还应利用多学科的优势,促进学科整合、交叉融合和转型升级,打造新兴学科,觅求新的研究方向,形成新的特色和优势。最后,政府和社会评价机构应改革现有的大学评价机制,更加科学地制定评价体系,既要考量规模和总量,也要考量增量与均量;既要考量成果产出,也要考量投入与效益;既要考量指标与数量,也要考量水平和质量。总之要正确地引导高水平大学保留和创造特色,并且积极鼓励和支持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

(责任编辑:吴绍芬)

参考文献:

- [1]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 [2]林蕙青.加快拔尖人才培养 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N].科技日报,2010-12-26.
- [3]刘理,彭时代.大学制度与大学特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5(4).